

# 境外漫游录

邓友梅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年 / 沈阳

与夫人韩舞燕在巴黎



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皇家学院大厅





马来西亚马六甲

在罗马





在伦敦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在广岛原子弹纪念馆前  
中间是巴金、冰心、草明、公  
木；左侧是艾芜，邓友梅在巴  
老身后；其左侧是奥德斯  
尔·村木。



柏林墙前

# 目 录

半是痛苦半是欣慰的回忆.....	1
竹风.....	10
事务局的同事们.....	16
有朋自远方来.....	26
巴黎漫记.....	32
漫步意大利（一、二、三、四）.....	57
访马其顿.....	110
“中国作家，请进！”.....	127
柏林归来.....	132
汉堡之行.....	139
从欧洲到美国.....	162
索尔兹伯里去德州.....	214
到老索家作客.....	225
忆老挝.....	234
南洋归来话南洋.....	239
马来西亚的“大伯公”.....	242
在南斯拉夫的日子里.....	245

# 半是痛苦半是欣慰的回忆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6月间，四十多年前和我在日本同一个工厂劳动的浜田 Miz子女士到了北京。她今年五十七岁，刚退休。退休后头一个志愿就是来中国访问，来看我。为此，四十年前的老同事们为她开了个送别会，题目叫“为与邓友梅先生见面而壮行”。会上，大家喊出两句口号，“为日中友好努力到底！”“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我从日本的报纸和朋友来信中知道了这件事，心中激动不已。对远在濑户内海边上的朋友们充满谢意，并引起许多联想。

世界上许多事，其结果常常与发起人初衷相反，四十多年前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发动的那场战争，曾将中日两个民族推到敌对位置上。一方的人民被蒙蔽蛊惑、驱赶到别人的国土上烧杀抢掠（不少人以为这是爱国），另一方的人民奋起、抗击、救亡、保卫自己的国家。两边兵戎相见。结果是侵略者遭了灭顶之灾；被侵略者取得了民族的解放。这个结局决非发动者始料所及的。战争也给普通日本人带来沉重的灾难，使大多数日本人觉悟起来。回过头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立志“决不让历史

悲剧重演”。中日两国人民由此结成好友，同心同德保卫共同的利益，这更是当年要用火与血来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人所未曾料到的。

日本的一份报纸在谈到我和老朋友的相会时，说道：“仅仅十三岁就成了‘征用工’的邓友梅君，常以痛苦的心情回忆起在日本的那一段饥饿和沉重劳动的日月。老朋友们的相见，使他得到安慰……”

这两句话很友好，也很真实。我这“痛苦的心情”并非仅仅出于对个人遭遇的回忆。四十多年前的事我很少谈，不谈不等于忘记，有些事是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今天的中国青年和日本青年都不大知道那时的实际情形。那次战争中，中国人在中国本土受到的灾害，大家都有印象。而在日本的华工遭遇，说出来青年们怕都很难相信。1942年，东条内阁通过了一个“向日本迁入华人劳动者”的法案。自此，在华日军和各类机关，便用各种方法“狩猎华人”：扫荡时在农村抓老百姓；城市里突然宣布戒严，把正在街上走的男人装上卡车武装押走；有的在街头挥旗招工，说“在中国某地工厂干活，一天三顿大米饭、馒头，管穿管住”。招来即装上货船押往日本。我在运华工的船上见到一个老人，本是邮差，他正在执勤送信，就被抓来当劳工。他一生给人送信，到头来却无法给自己家写封信说清自己的下落。我是在天津被招工的招到“山东”去当“学徒”的，结果却以“赴日见习”的名义送到日本当了“征用工”。

我刚十三岁就被迫从事奴隶劳动。“文革”中“四人帮”的打手们却据此给了我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卖国投敌”的罪名！记住，我们也有这样的“同胞”！

这些各类名义的“华人劳动者”所受待遇如何？我说几个

数字就可想出个大概。从1943年4月到1945年5月，送到日本的华工共有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九名。运行途中因为锁在货舱里，挤在矿石上，空气恶劣，不供饮水，就死去五百八十四名（我就是和矾土矿石关在一个船中，由不满两千吨的“千岛丸”送到日本的）。从在下关上岸，在送往劳动地点的途中，又死了二百三十名。还没干活，山口县警察局特高课便抓走一批，从此没有下落。这样，到日本投降前夕，共死去八千八百七十八人，占华工总数的22.8%，就是说四个半人就有一个死在日本了。秋田县有个花岗矿区，有九百七十九名华工。最老的六十七岁，最小的十六岁。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以上，每天伙食只给两个馒头，还是一半粮食一半菜叶混合蒸的。有位华工饿得受不了，拔了宿舍前一把野草塞在嘴里，被日本管理人员看见，就把全体华工集合起来，用烧红的铁条烙他！草都不许吃，劳动强度却丝毫不能减。监工手执木棒盯着，手脚一慢就拳打脚踢，累晕倒地，监工泼桶冷水浇醒后，接着还得干，稍有反抗，说杀就杀！华工们实在忍受不住了，有一部分在八路军战俘领导下举行暴动。日本兵把暴动镇压下去后，把所有华工全押到俱乐部门口集体受刑。整整三天三夜，不给一口水喝，不给一口饭吃。用铁针往指甲里钉！把华工捆倒在板凳上，捂住鼻子，一桶一桶地往嘴里灌凉水，然后用力踹他的腹部，血和水从耳、鼻、口中箭一样地喷射出来。这样一次就折磨死八十多人，不到两年，九百多名华工剩下不到一半了。秋田事件后，各地更加强了对华工的迫害。我所在的地方，警察几次半夜搜捕，让全体华工整夜罚站：晕倒了就用绳子捆起来吊在双层床的柱头上！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所回忆的，决不是我个人的遭遇，而

是我们整个民族苦难的过去！而且那心情也远远不止是“痛苦”！有的朋友、包括日本几位作家，都劝我写写这方面的东西，揭露法西斯分子的真相。我迟疑之后没有写，我在一些日本朋友身上看到了真诚的负疚忏悔。中日友好是千秋大业，大家向前看，就不想再提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何况我也看到了战争给日本的普通老百姓所带来的灾难！

当然，在日本，为那场罪恶的战争辩护的人是有的；要为东条英机招魂的人也是有的。但究竟是极少数。并且也没有多大市场！我去年在东京，看到一辆黑色的汽车，上边写满复仇主义的标语，通过扬声器大喊四十年前喊过的口号。车一边开一边喊，街头行人竟没有谁注视它一眼，那阵势既可怜又可笑。有这么几个人干这个也许比没有好。可以提醒人们别太大意。现在我说起上边那些情况，仍然不是要翻旧帐，只不过讲讲我以“痛苦的心情”都想到了些什么！

日本报纸说我和当年的伙伴们的相会，“得到了安慰”，这也是实情。

相信日本人中也有好人，是我到日本以后的事。因为在国内我只接触过“扫荡”中的日本军人，横行在市街上的醉酒浪人。到了日本才和一些普通的日本工人、学生、职员接触。那时的日本工厂中，多半是妇女、老人和有残疾的男子。此外，因为战争，学校停课了，学生们全来“勤劳俸仕”。他们食物也很少，而且顿顿是“大根”就一小盒米饭，穿的劳动服甚至比我的还破。因为我从中国穿去的衣服究竟只穿过一年，还是棉布的。他们却是穿了好几年的代用品。年轻的女孩子有一身干净整齐衣服，一进厂门赶紧到澡堂换下来锁上，然后穿上满身是补丁和破绽的衣服，以致于下雨天共同推一辆轱辘马时我都不

好意思看她们。有一位老大娘和我一个车间，每天上班她头一件事是找两个水泥纸袋裹在腿上、用绳子绑紧，不好意思地对我说：“冷啊！冷啊！”我病了，发着高烧干活，她悄悄把一个桔子塞给我，悄声说：“不要对人讲。”可她又说：她的儿子正在中国打仗，她对我好，中国人也会对她的儿子好。佛爷有眼，暗中对人是公平的。在勤劳部（军方派驻的监视我们的机构）的日本工头和宿舍里的“教官”打我们、侮辱我们时，却有另一部分日本人为此感到羞愧和不安。宿舍管理员中元幸广，那年他也不不过十七八岁，一看到别的日本人打我们，他先躲起来。再见到我们时，他就红着脸低头走过，甚至于小声说，“原谅我，我没办法保护你！”一位在试验室“勤劳俸仕”的女学生，不管别人如何歧视、虐待中国人，她碰见我们时总是深深鞠一躬，笑嘻嘻地说：“先生你好。”有一次别人打了我，事后她却来道歉，好像是她打了我似的，两眼含着泪说：“真对不起，真不好意思……”

后来，日本军阀把战火引到自己的国土上来了。美军的空袭日夜不断，伤员堆满了医院，连车站都变成了包扎所，倒霉的仍是这些老百姓。为了疏散，日本警察强制拆掉整条街、整条街的房子，日本房子多是竹木结构，柱子上拴根绳子，组织几个壮汉口喊“一、二、三！”哗啦一声，一家几口就立刻失去了栖息之所。老人、孩子、妇女，背着包，拉着车成队成行地在瓦砾堆中一边哭泣一边往四处流散。而电台里还在广播“圣战到底，决心玉碎！”“少吃一口饭吧，省一粒米就是为国家省一粒子弹！”当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看到发动战争的国家受到惩罚，我解恨，我痛快；另一方面我真希望这惩罚不要落在那位老大娘身上，不要落在那位女学生身上，不要落在

这些拿我当兄弟待的日本人身上！

我就是在这种心情下离开日本的。我们在拂晓前离开德山，天还黑着，几位尚未撤走的邻居，老太太，背着小孩的小姑娘，穿件奇怪西装的种菜老头，起来在路边给我们送行。“再见，这下好了，平安回去了，你们亲人该高兴了！一路顺风吧！”

过了三十五年，我又到日本。这次是以中国作家的身份去的。承蒙清水正夫先生和秋岗家荣先生关照，让我回德山看了看。江山依旧、世事已非，德山变了样子，工厂变了样子。熟人死的死了，散的散了。厂方只为我找到两位当时在厂中做工，现在仍然在厂中做工的老工人。一位就是浜田女士。当年我们不在一个车间，我不记得她。我问她，当年她是否住在“爱国寮”女工宿舍？她把眼睁得大大的说：“爱国寮？在一次大轰炸中全炸光了！许多朋友全死在里边了！连爱国寮三个字也多年没有人提它了！”说着她擦起了眼泪，一边擦泪一边同我回忆当年的情况。她说“这些事现在厂里的青年全不知道！应该叫他们知道的！”

德山曹达工场现在负责人一再说：“当年你们在这儿吃了苦了，真对不起！”他又说：“这个工厂因为战争中的行为，终战后封闭了八年！老的领导人撤下去了。现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很好，正有一艘往中国去的船停在码头上装化肥呢！”“我们厂要成立邓友梅文学研究小组……”

那天，会社的朋友，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的朋友（日本称广岛一带叫中国），给了我热情的接待。几位新朋友对我很好。我眼里总含着一泡热泪，忍着不让它流出来。我感谢我们的党！同一个中国人，当年在“征用工”名册上和今天在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名单上是相同的“邓友梅”三个字，其境遇何以有此天

壤之别呢？根本原因是我的祖国变了，由半殖民地的衰弱的中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的国家。这个变化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造成的。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可我们的国格很高。“看父敬子”，我才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当然日本也变了。旧的日本变成新的日本，使它东方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扬。我为此高兴，我感谢我们的党领导人民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感谢日本人民对我的友好情义。

我这次到德山见到的老朋友太少，是带着遗憾的心情回东京的，从东京又去了奈良，刚到奈良，意外地接到来自光市的一个电话，竟是那个试验室的中学生西村打来的！她说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但到处打听，终于打听到奈良的旅馆里。她说本来要来看我，可女儿在生孩子，作外祖母的不便离开。她告诉我，全家人在战争中几乎全死了，战后她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现在儿女都已大学毕业、结婚生子了，生活安定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面。回国以后，我又接到了中元幸广通过东方书店转来的信。信中说：“我以满怀歉意的心情问候你。你还肯与我通信吗？那个时期日本人作了不少对不起你的事，可我自信绝没有的××先生们那样欺侮中国朋友的。”是的，我记得他，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中元对我们说不上有恩，但在那种时候、那种空气下仍然平等待我，就很难能可贵了。我立刻给他回信，从此续上了友谊。他热心日中友好事业，六十岁的人了，还跟着中国的电台教学学汉语。他拿到毕业证书后高兴得写信告诉我：“这回我为日中友好工作，又多了一样本领了。”

去年，我去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中元和西村两位在报上看到消息，分别从光市和美称先乘火车，到广岛又换飞机，千里

迢迢赶到东京来看我。我整天开会，日程紧张，几乎抽不出时间来陪他们，中元特意在我住的旅馆附近另找一个住处，为的是抓紧我会议的空隙时间来谈天。有记者来采访我，就问他和我怎么相识的。他坦率地说：“邓先生在德山劳动的时候，我做他们宿舍的管理员，他们受到许多残暴的待遇，我没有保护，觉得欠他一笔帐，我怀着抱歉的心情来看他！”我赶紧声明，中元是我的朋友，是我记得的很少几个不打中国人、不骂中国人的管理员之一！西村来的晚了一点，头天晚上十点来看我，第二天我就去京都了，我很为她远路而来不能长谈而抱憾。谁知我去京都几天，回到东京乘飞机回国时，她和妹妹竟然在成田机场出现了。我问她怎么还在东京，她说专等着为我送行。这几天她住在少年时朋友福本女士家中。福本女士也是当年在德山“勤劳奉仕”过的，和西村一样，家人全在战争中遇难了，所以两人多年来情同姐妹。战后困难时期一起谋生。日本经济好转后，两个人的丈夫在事业上都有了发展，她俩经济富裕了，又有余钱，便结伙旅行，漫游了大半个地球。一回忆起那场战争，两个人都谈虎色变地说：“真可怕。那时做梦也想不到今天这种生活，再不要有战争，再不能叫孩子们走入那个人间地狱了！”福井女士讲，她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她和女儿有一次去华盛顿的“阵亡将士墓地”参观，福井看到那么多二次大战中牺牲的军人墓碑，流下了眼泪。女儿问：“妈！这里死的是美国兵，你为他们掉什么泪！”福井对我说：“孩子们不懂得战争是怎么回事，没法和她说清楚。战争一起来，交战双方的老百姓都要受害。可日本是战争发起国，想到美国母亲丧失儿女的痛苦，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了世界各国的母亲们，我们要永远反对战争！”

浜田女士拿出了“壮行会”的照片。我看到上边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费了好大劲才认出一位山本大娘和一位女士，她们原是在我们住地当伙夫和伺候日本教官的侍者。当年年长的也不过二三十岁，像西村、浜田、福井等人还只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他们以亲身经历悟透了“和为贵”和“日本必须友好”的大道理，身体力行、为促进我们的友谊而热心奔走。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我知道，“邓友梅”三个字只是个代名词。他们借此表达对我们国家，我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朋友们的这次小聚会，是一次最好的纪念方式，我想把他们在会场上发出的呼声写下来，也作为我的行动方针：“为中日友好努力工作！决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 竹 风

“竹风”，凡看过郑板桥画的人，都有极深的印象。“竹风”一词不大常见，我是在长岗京才弄懂这个词的。

日本的古都，有三个：京都、奈良，大家都熟悉；还有一个长岗京，就不大为人所知了。我一向把冰心老师视为日本通，谁知她竟和我一样，是这次才知道的。

长岗京不为人知，一是它作为京城的时间短；二是它后来没有发展成大都市，至今仍是个只有七万人口的小城。尽管如此，它仍有着故都特点，那就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刻痕迹。

长岗京以产竹著名，有贵客来访，主人总要以笋飨客。宴会上用的碗、盘、筷，全以竹制，酒杯则是一段新伐下来的尚带着翠叶的小竹筒。酒宴完毕，主人就把酒杯赠与客人当作纪念品。

我们到长岗京那天，正下瓢泼大雨，汽车突然在一片竹林边上停下，市长先生请我们打开车窗欣赏竹林的景色。竹林深处正有一位妇女和一位壮年男子举着此地特有的长头竹镐在挖笋。主人招呼了一声，那位妇女捧着一颗鲜嫩的大笋跑过来，浑

身往下滴水，一位日本朋友介绍说：“这是市长夫人。”

夫人深深行了礼。我们问：“为什么这么大雨，你还来挖笋？”

旁边的人解释说：“夫人是为欢迎中国作家，特意来表演给大家看的。”

我们一听，赶紧从车上下来，向夫人道谢。她说：“原来是要请大家来一道挖笋的。下雨了，只好由我挖给大家看了。”我们请市长先生劝夫人回去。为了不致让女主人再挨浇，说完赶紧回到车上，离开竹园。

在车上，我问陪同的朋友：日本各地皆有竹林，为什么长岗京对竹子格外重视？”那朋友说：“竹与竹不同，这里产的是孟宗竹。全世界到处都有竹林，可孟宗竹只有杭州和长岗京两地才有。”我说：“怕不见得吧？”他自信地说：“别处即使有，也是从这两个地方移出去的。这竹子，原来只有杭州产，一千年前，僧人道无把它引到了长岗京。从一千年前，就虚心向中国救教了，还有哪个国家能超过日本呢？”

我这才明白，长岗京人重视孟宗竹，首先着眼的是它所代表的中日友谊，它所代表的日本人民那种勤奋好学、虚心求教的精神。

由于这一点启发，我觉得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

我到奈良时，鉴真大师已启驾归国探亲。陪他回国的是当代唐招提寺的住持森本孝顺长老。在御影堂内，人们对我讲了许多森本长老的事情。长老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自幼年入寺，供养鉴真和尚。早上朝见活像，总先要问一句：“你昨夜休息得好吗？今天可是上好天气，您会觉得愉快的。”晚上定省，又总要问一声：“您今天觉得身体安泰吗？早一点休息吧。”数十年如一日，风雨阴晴，从不间断。前年我国领导人访日，在